■教育技术

# 论先秦史本科教学中的史料运用及相关问题

王红亮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先秦史涵盖面广、涉及内容多以及史料解读难度大等原因，作为知识储备不足的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常常出现畏难情绪，以致逐渐失去了学习先秦史的信心和兴趣。因此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先秦史料，进而达到熟练运用，对于先秦史的学习显得至关重要。要正确解读先秦史料，应对先秦史料的基本概况、特点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后，运用正确的方法对其进行准确解读，才能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

**关键词**：本科教学；先秦史；史料运用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6)11－0047－06

PDF **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6.11.012

# On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f Pre-Qin History and Related Issues

*WANG Hong-l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Pre－Qin history, with its rich contents and deep connotation, causes great difficulties to history majors and thus makes most of them lose confidence and interests in it.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eachers should make effort to instruct students to interpret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correct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a general idea about its basic knowledge and characteristics. Only if they can master the ways to interpret historical materials, can they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Pre－Qin history.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Pre－Qin history;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所谓“先秦史”，是指中国历史上秦代以前的历史，具体包括夏代及其以前、商代、西周、春秋以至战国的历史。先秦史由于时间跨度大，所运用的史料，其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也有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夏代及其以前，尚未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基本上是以考古学、人类学为主的探讨。商周时期，除了一些基本的传世文献外，另有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等出土文献可以依据。因此，所谓先秦史的史料，基本上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一些考古资料。

就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一方面对先秦史颇感兴趣，因为它是中国历史的源流，魅力无限；另一方面，又由于先秦史史料少且难懂，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短时间内又难以入门，故学生又视为畏途。那么，如何帮助本科生尽可能快地掌握基本的先秦史知识，培养学生对先秦史研究的兴趣，实际上非常必要。

## 一、先秦史史料的基本概况

先秦史的基本史料实际上包括四类，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等。下面我

**收稿日期**：2016－04－09；**修回日期**：2016－05－3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H005）；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SZYB09）

**作者简介**：王红亮，男，甘肃秦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先秦史。

们就这四类资料作以简要介绍。

**(一)传世文献**

现存完整的先秦史的传世文献,如果依照传统的分类,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

经类:如《易》、《尚书》、《诗经》、"三礼"(《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包括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五类,古称"五经",如再加上失传的"乐经",则为"六经"。那么,到底如何选择经书进行阅读呢?我们在阅读先秦史书时,一定要选好的版本。这是因为,先秦古书,流传至今,历经无数书手抄写、排版、整理等过程,里面或多或少地有许多错讹、增删甚至改写,因此,古代学者在阅读这些典籍时,经常进行一些校勘、考订的功夫。后来历代学者把这些校勘考订的成果进行总结,挑选出了一些好的版本。可以说,只有阅读这些好的版本,才能省去校勘考订的之功,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本科生而言,比较好的关于经书的校勘本是中华书局出的《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是清代学者阮元校勘的。另外,清代学者考订先秦典籍的水平最好、成果最著,中华书局出的"清人十三经注疏"可以说是集中国古代学者考订先秦典籍之集大成,也是非常适合本科生阅读的。当然,现代一些著名学者对经书的注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等等。

史类:如《国语》、《战国策》、《逸周书》、《史记》中的先秦史部分等。《国语》主要记载西周厉王以后及春秋史事。比较好的版本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的《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清代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的《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 年),以及清代董增龄撰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 年)。前二者都经过整理标点,后者为影印,阅读起来不是太方便。《战国策》主要记录战国纵横家的一些言论。其比较好的版本是范祥雍笺证的《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逸周书》各篇成书年代不一,但无疑是一部先秦古书。[1]103 现在比较通行的本子是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的《逸周书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史记》是西汉的司马迁所著,虽成书于汉代,但由于该书依据了许多先秦典籍(有些可能已经亡佚),再加上司马迁杰出的史学才能,使得《史记》一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现今通行的版本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三家注(中华书局,2014 年)。

子类:如《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等等。关于先秦诸子,大部分产生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现在比较好的是由中华书局出的《新编诸子集成》,选取都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注释本,断句标点,颇便阅读。

集类:如《山海经》、《楚辞》等等。《山海经》是我国上古时代的地理、历史、神话、动物、植物、矿产、医药、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今人袁珂校注的《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2 年)是比较好的注本。《楚辞》收录了战国至两汉间楚地诗人的作品。现在通行的版本是黄灵庚的《楚辞章句疏证》(中华书局,2007 年)。关于利用《楚辞》来进行先秦史研究的,可参看《孙作云文集·楚辞研究(上)·楚辞与上古史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以上是简要介绍,如想深入了解,导读性的可以参看英国汉学家鲁惟一主编、李学勤等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郑慧生的《先秦史要籍介绍》(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王晖等的《先秦秦汉史史料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等著作。

**(二)出土文献**

与先秦史相关的出土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钱币文、玺印文、封泥文、陶文、盟书等等,其中前三类最为重要。

甲骨文,是商周时期人们契刻或书写在卜甲、卜骨及其他动物骨骼上的卜辞、记事刻辞及其他文字。甲骨文基本上属于商代后期之物,另外在陕西周原还发现了西周甲骨。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前辈学者指出,甲骨学的入门读物为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资料性的有《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 年)、《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 年)等等。

金文,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人把金、银、铜、铁、锡都称为金。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也简称"金"。金文有商代金文(大约从商代中期开始)、两周金文等,都是研究商史、两周史的重要史料。金文的入门读物为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马承源的《商周铭文选》,关于青铜器方面的知识可以参看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资料性的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2001 年),锺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形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 年),吴镇烽编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简帛文字,是指书写在竹简、木牍以及绢帛等上的文字。截至目前,我国已出土几十万枚战国、秦、汉、吴魏晋时期的简牍资料。其中对先秦史研究来

说，战国简、秦简尤为重要。就楚简而言，郭店楚简偏重思想史，包山楚简偏重制度史和法律史，上博简、清华简则更偏重历史。就秦简而言，睡虎地秦简偏重法律史，里耶秦简则偏重基层社会及制度史。初学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

**（三）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

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以考古材料，并辅助于民族学资料。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地探讨，在以文献为主的同时，也要注意充分运用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编著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卷》《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等。如想进一步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进展，可以参阅《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报刊杂志。另外，也可适当地参考一些周边民族的民族志材料。

## 二、先秦史史料的基本特点

先秦史史料跟中国古代史其他断代的史料不同，而有其自身的特点。总的特点有三：一曰本身的资料少而所涉及的内容多，二曰解读的难度大且专家的分歧大，三曰新资料不断涌现而陈说时被证实或证伪。下面分别说明之。

先秦史史料的特点是本身的资料少而所涉及的内容多。先秦时代距离今天遥远，所以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少。据学者统计，现存先秦古书有 60 多种，[2]19－32数量不可谓多。但是，这些先秦古籍，从汉代开始，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进行注疏。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对其研究的成果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所以，后代学者要进行研究，必先缕析清楚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此之多，看完如何可能？因此，清代学者的办法就是专研一经，“竭毕生之力，熔铸几百种参考书才泐成一稿”，[3]218而且是世代相传，所以清人研究经典成名的学者，往往有其家学渊源。比如《左传》大概有 19 万多字，但从其成书以至到清代，对其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清代注疏《左传》，最有名的当属《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而此书是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前赴后继之作，[4]4即便如此，这部书也未能完成，只到鲁襄公五年，可以说是只完成了三分之二。晚清著名学者刘师培，是刘文淇的曾孙，对《左传》深有研究，杨伯峻认为除过此人天资聪慧之外，其家学渊源也是很重要的因素。[5]125又如《仪礼正义》，是清代胡培翚承继其祖胡匡衷、其父胡秉虔之家学，积四十余年之力尚未完成，经族侄胡肇昕等的进一步增补，方才完成。古人讲“皓首群经”，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先秦史史料另外一个特点是解读的难度大且专家的分歧大。先秦时期的语言，和现代汉语差别甚大，因此，今人要直接阅读先秦古书很难看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汉代人的注、唐代人的疏以及清代和近现代的注释成果。但是，由于注释家所依据的材料不同，所以所持的观点相异，甚至于说相差甚大。比如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左传》庄公四年载：“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杜预注：“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扬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则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孔颖达疏：“‘尸，陈也’，《释诂》文。荆即楚之旧邑，故云荆亦楚也。楚本小国，地狭民少，虽时复出师，未自为法式，今始言‘荆尸’，则武王初为此楚国陈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后人用之。宣十二年传称‘荆尸而举’，是遵行之也。”[6]3828可见，杜预和孔颖达都解“荆尸”为“楚陈兵之法”。“陈”与“阵”上古音同为定母真部字，“陈，古阵字”[4]140，因此“楚陈兵之法”实际上犹言“楚军阵名”，后来中外注疏家多循此说。

1975 年 12 月，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了一批秦代简牍，其中在甲种《日书》“岁”篇有秦楚乐名对照表，其中有一楚月名称为“刑夷”。[7]190有学者据此认为此“刑夷”即《左传》中之“荆尸”。“荆”从“刑”声，《说文·艸部》：“荆，楚木也。从艸、刑声。”“尸”、“夷”在古文字里常通假，所以“刑夷”读为“荆尸”从文字音韵学上说是可以的。如此看来，杜预以至近现代学者的注是否都错了呢？到底该信从谁的说法呢？[8]

再次，先秦史史料的第三个特点是新资料不断涌现而陈说时被证实或证伪。自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后，对出土材料学者普遍越来越重视，而新材料也不断涌现。刚开始是甲骨文，稍后是金文，近二三十年来简帛文献大量公布，简帛学已经成为显学。新材料的公布，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这些材料检验前人说法之正确与否。学者提出的观点，是否经得起新材料的检验，直接影响学者的学术声誉。如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其做的考释古文字的文章，“很少出现问题，考释命中率很高”，所以被称为是“当代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第一人”。[9]在这种形势下，要在先秦史领域有所成就，必须要有一种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精神，又得具备严格的自律意识。

可以说，先秦史史料总的特点是本身的资料少而所涉及的内容多，解读的难度大且专家的分歧大，再加上新材料不断涌现，陈说往往或被证实、或被证伪。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初学者，要利用这些资料来进行先秦史的学习和研究，往往由于知识储备不足，或坠入迷雾而不知返途，或人云亦云而不得已见，或由于不明了学术源流而株守旧说。那么，本科生面

对先秦史史料,究竟如何进行解读呢?

## 三、先秦史史料的解读问题

实际上,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对先秦史研究来说,史料的准确解读是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那么,作为初学者面对先秦史史料,到底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解读呢?前辈学者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去汲取呢?

先秦史料中最基本的是先秦古书,而古书中核心的是经书,也就是经学。因此,解读先秦史史料,关键是怎样读懂这些经书。在中国两千年的学术史上,从汉代开始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这些先秦经典,历经唐、宋、明、清历代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在这些学者当中,成就最高的要数清代学者,而清代学术的精华则是以段(玉裁)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的"段王之学","段王之学"的核心则是小学。清代学术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研究经学要以小学为根基。所谓"小学",就是传统学术的音韵训诂之学。今人读古书,特别要注重清人的研究成果,从清人的成果入手,正如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说:"欲读古书,非观清儒及近人之笺注序跋不可,否则不独事倍功半,或且无下手之处"。[10]185

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说:"训诂声音明则小学明,小学明则经学明。"[11]1 明白音韵训诂才能弄清楚小学,弄清楚小学才能明白经学。而就先秦史来说,小学、经学明则是先秦史研究之阶梯。正如晚清著名学者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12]570 张氏此言立足小学,而视野广阔,从小学、经学、史学、理学、经济(经世致用)过程之顺序,可以说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治学与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具体到我们先秦史学习来说,从小学、经学、史学、理学(可以说是哲学、思想史层面)这一路径,是千百年来学者治学之宝贵经验,我们切不可废弃。

以上所言,是要强调小学是经学的根基,经学是先秦史研究之根基。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经学虽然是史学的根基,也要深刻领悟两者的差别,以及运用经学解决史学问题时的有限度问题。刘家和先生曾举出一个宗法制中宗统和君统是否合一的例子[13],颇能说明运用经学解决史学问题的有限度问题,我们下面引述下刘先生所举的这个例子。

众说周知,宗法制是先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其中宗统和君统是否合一是困扰两千多年来史学界的一大难题。就经学家而言,一派主张宗统和君统合一,一派主张二者是分离的。

1.主张君统与宗统分离,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礼记》和郑玄:

《礼记·丧服小记》和《大传》中都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这就是宗法。关于"别子",汉代郑玄有以下三种说法:

(1)"太祖,别子始爵者,《大传》曰"别子为祖",谓此。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13]2890

(2)"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也,谓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祢先君。"[14]3240

(3)"别子,谓公子若始来在此国者,后世以为祖也。"[14]3268

《大传》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郑玄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自戚于君位,谓齿列也。所以尊君别嫌也。"孔颖达疏:"此一经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绝宗之道也。"[14]3268

据上所述,则君统和宗统是分离的。

2.持君统和宗统合一的,这方面主要有以下资料:

《诗·大雅·公刘》:"君之宗之。"说明公刘身上宗统和君统合一的。毛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郑玄笺则云:"宗,尊也。"

《诗·大雅·板》:"大宗维翰"、"宗子维城",毛《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郑玄笺则云:"大宗,王之同姓之嫡子也","宗子谓王之嫡子。"

如果从经学角度分析,面临这种情况,到底是信《礼记》、郑玄的说法,还是从《诗》与毛传的说法,如从纯经学的角度考据和训诂的方法入手,实际上很难抉择。这说明,纯粹以"经学入史学",要做出明确判断,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纯粹以经学入史学的限度问题。那么,面临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入手呢?

刘家和先生认为,这时候我们借助于金文的材料,可能较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他举了以下金文的例子:

(1)何尊:王诰宗小子于京室。

(2)盠驹尊:王弗忘厥旧宗小子,……盠曰:王倗下不其则万年保我万宗。

由(1)可见,王承认臣下为同宗。由(2)可见,王承认同宗的人,而且王永远是万宗的保护者。可见,西周金文里也是君统和宗统合一的。宗法制里宗统和君统是否合一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以上说法是否正确,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新材料的证实,但无疑根据金文,对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判断的例举。

以上例子是要说明,如果我们仅仅按照"从经学入史学"的路子,有时候颇难理出头绪。也就是说,

这一路子实际上有其限度——实际上任何理论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我们在运用时，综合其他一些理论方法，对我们解读先秦史史料颇为重要。

## 四、先秦史史料的运用问题

先秦史史料，从周秦，历汉唐明清，传流至今，颇有问题。大抵越古的书，问题俞多。譬若古书的真伪问题，作者归属问题，篇目编次和卷帙问题，书中有无后人增益或删削的问题等等。[15]179 因此，我们在具体运用这些史料时，要特别注意，须经过一番考证的功夫。

第一、甄别史料的年代、性质和真伪等。先秦古书，成书年代不一，万不可被其书名所迷惑。譬如《周礼》，又称《周官》，古代学者多认为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但其中"所讲地理民情，全为战国时秦、汉间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礼》，则周朝声教所及，与战国及秦、汉差不多。然事实不如此"。[16]3 因此，如果使用《周礼》来说明西周的制度，很容易出问题。除此之外，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还有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等等，无论如何，我们在使用《周礼》时，应该多方面考虑，尽量使用多重证据。

古书的真伪问题，向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看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崔述的《崔东壁遗书》以及顾颉刚的《古史辨》等。凡是经学者考证，公认的伪书，不能作为证据。[17]12－13 但是，如果我们能考辨出伪书作伪的时代以及原因，再根据其来研究作伪者当时的历史，却可以变"伪"为"真"。诚如陈寅恪所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能在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18]248

第二、重视出土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往的古书考辨，多是就书论书，这被称为是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近些年来，由于一大批战国秦汉简帛书籍的出土，使得在古书之外，提供了时代较为明确的地下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对古书进行考辨，学者称之为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19]28－33

可以说，第一次对古书的反思，辨明了一批古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其中有成绩也有冤假错案。比如阎若璩等清代学者考辨《古文尚书》是伪作，已经被学者所公认。这是成绩。但是，以往所认为的《晏子春秋》、《鹖冠子》是汉代人伪作，现在根据出土的银雀山汉简可知，这些古书的成书不会晚于战国。[20]405－406 这可以说是对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是，也有学者错误地理解或无视这些出土文献，对一些已成定谳的辨伪成果（如上文提及的伪《古文尚书》）进行翻案，其结果又回到了信古过头的老路上了。因此，正如学者所说的，"在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一方面要纠正疑古过头的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过头的倾向"。[21]

第三、运用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时，均须进行一番考证的功夫。刘家和先生回忆早年师从钱穆先生学习，觉得钱先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须知晓清儒的研究成果，而这一点也成为他治中国史一直信奉的原则"。[22] 这是前辈学者治学的秘诀，值得我们充分汲取与继承。那么，考证要遵循什么原则呢？对此，赵光贤先生引用胡适的话说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份话；有十分证据，才说十分话"。[17]11

应该说，不管是研究传世文献，还是研究出土文献，对文献的考证是其前提，也是关键。如果这一前提缺失，那么其结论不管如何宏大，最终若泡沫一般终究破灭。

第四、正确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二重证据"的关系。王国维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23]2－3 可以说，正是由于"二重证据法"的应用，极大地促进先秦史研究的进展。但是在运用二重证据法时，必须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一方面，要分清主次。在二重证据中，到底是以出土文献为主，还是以传世文献为主？当今的先秦史研究，较于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普遍比较重视，甚至于有一种趋势是研究先秦史纯粹依据出土材料，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无独有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疑古思想盛行之时，就有人提出这种观点：这分别真伪的困难既然如此，何者绝对可用作史料，何者绝对的不能用，真是个极难的问题了。所以用载记（指传世文献——引者按）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载记既然不能与"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我们只好去问第二种材料，"古人直遗的作品"。……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24]269－270

对此，顾颉刚先生指出，但李先生这句话颇有过尊遗作品而轻视载记的趋向……我以为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

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25]270—271

实际上，当时出土文献还不多，即使是九十文献为主。金景芳先生说："我认为研究古史，必须文献、实物并重，而以文献为主。"[26]5 多年后出土文献大量涌现的今天，出土文献仍然不能代替传世文献，在两者关系上，应以传世裘锡圭先生也说："相对出土文献而言，传世文献还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出土文献必须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27]298

另一方面，当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发生矛盾时，当如何处理？我认为，对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二者的特点。先秦古书流传至今的不多，但流传下来的都是"宝"，余嘉锡先生形象地说："（古书）为其阅时既久，亡佚日多，其卓然不可磨灭者，必其精神足以自传，譬之簸出糠粃，独存精粹也"。[10]184 但是，传世文献确实流传日久，历经无数抄写、改写，甚至于作伪，里面可能错讹混杂，真伪杂陈。这就是传世文献的优缺点。出土文献由于时代明确，未经后人改写，所以史料价值颇高，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盲目崇信。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要讲遗作品（指出土文献——引者按）直接出于古人，载记（指传世文献——引者按）何尝尽是后人写的。要讲载记多伪作难以考定遗作品又岂纯粹无伪作而又易考定呢？"[25]270—271 事实确实如此。

西周金文是研究西周史的第一手史料，是可信度应该很高。我们从传世文献得知，西周从中晚期开始，逐渐成衰微之势。但是，如果撇开文献资料，仅从铜器铭文来看，西周早、中、晚期没有多少变化：内政上周王皆有贤德而尽力于国事，外交上周师征讨基本上每战必捷，他族也俯首称臣、进献纳贡。即便是周王朝即将覆灭时也如此。假如我们仅仅依据出土金文，我们得不出西周衰微、灭亡的征兆。可见，出土文献作为第一手资料，如果我们对其所载史事轻信而不加辨析，就容易上当。[28]205—206

实际上，任何文献记载，都是人写的，因此或多或少会参杂作者的主观意图。如此看来，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须考信。那么，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我们须考察相关学术史，从学术史研究的历史长流中，辨诸家之异同，探明其源流，从而在史源学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作以讨论。

总之，对先秦史史料地准确解读、运用，实际上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必须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才有可能纯熟。作为本科生，只有端正态度，肯下苦功，才能在先秦史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 郑慧生. 先秦要籍介绍［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刘文淇.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5］ 杨伯峻. 我和《左传》［C］//杨伯峻治学论稿. 长沙：岳麓书社，1992.

［6］ 阮元.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8］ 王红亮.《左传》之"荆尸"再辨证［J］. 古代文明，2010（4）.

［9］ 华林. 裘锡圭：当代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第一人［N］. 社会科学报，2014—5—8（B5）.

［10］ 余嘉锡. 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 王念孙. 说文解字注序［C］//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 张之洞.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 刘家和. 史学和经学［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3）.

［14］ 阮元.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 周祖谟. 古书通例·前言［C］//余嘉锡. 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16］ 梁启超.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 北京：中华书局，1955.

［17］ 赵光贤. 我的自述［C］//亡尤室文存［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8］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C］//金明馆丛书二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9］ 李学勤. 对古书的反思［C］//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20］ 裘锡圭. 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C］//裘锡圭学术文集（四）.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1］ 裘锡圭.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N］. 光明日报，2013—11—14（B11）.

［22］ 周晓菲、徐畅. 刘家和：史学研究的攀登者［N］. 光明日报，2015—6—18（10）.

［23］ 王国维.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4］ 李玄伯. 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C］//顾颉刚. 古史辨（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5］ 顾颉刚. 答李玄伯先生［C］//顾颉刚. 古史辨（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6］ 金景芳. 中国奴隶社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7］ 裘锡圭、曹峰.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C］//裘锡圭. 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六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8］ 夏含夷. 西周之衰微［C］//古史异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李兆平］**